

评论员观察

无论如何,都不能置必要的申请条件于不顾,随意降低公租房的门槛,哪怕是“经研究决定”也不行。即便门槛降得不算离谱,那也得先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。

公职人员腾退公租房,省委巡视组没来会咋样



评论员 王学钧

近期,湖南省涟源市的几个公租房小区人来车往,很是热闹。766户公职人员正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,腾退违规占用的公租房。这一幕,既令人欣慰,又发人深省。

在当地,公职人员违规占用公租房并不是什么秘密。涟源市是一个城镇人口不足30万的县级市,建成区面积很小。有限的几个公租房小区里“挤”进了大批公职人员,人们不会看不到,不会没意见。

这么多公职人员占用公租房太不正常了。作为一种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的保障性住房,公租房面向的是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。毫无疑问,绝大多数公职人员并不在公租房政策的辐射范围之内。

如果符合相关规定,个别确有住房困难的公职人员可以申请租住公租房。但

是,根本不具备租住条件的公职人员大量甚至“成建制”地涌进公租房小区,违规占用公租房,这不行!

如此与民争利,不仅严重背离了公租房政策的初衷,也严重损害了公职人员的形象和相关部门的公信力。766户公职人员腾退违规占用的公租房,理所当然!

仅简单腾退并不够,还应严肃问责。

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:公租房小区建好了,房源多,而申请者数量不足。当地政府经研究决定降低门槛,向公职人员开放。这套说辞根本不值一驳。就算申请者数量不足是真的,也该仔细看看为什么,是宣传不到位,还是公租房真的建多了。宣传不到位,那就加大宣传力度,让更多的人参与申请;如果真的是房子建多了,那就意味着调研不够决策失误。

无论如何,都不能置必要的申请条件于不顾,随意降低公租房的门槛,哪怕是“经研究决定”也不行。即便门槛降得不算离谱,那也得先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。就算短期内入住率不高,不符合条件的公职人员也得靠边站,当地政府再怎么“研

究”也得守住底线,不能让公租房变得名不副实。为此,不仅相关公职人员应该把“租”来的好处“吐”出来,相关决策者也应该被追究领导责任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涟源市这场集中腾退是在省委巡视组入驻之后发生的。今年9月7日至11月7日,湖南省委第十一巡视组在涟源市工作了两个月。其间,有群众举报公职人员违规占用公租房,转租转卖,导致真正需要房子的贫困户无房可住。为此,巡视组不仅专门向涟源市下发了交办函,还在相关会议上明确要求涟源市对公租房问题“动真碰硬”。随后,当地才有了对公职人员占用公租房情况的调查摸底,才有了766户公职人员腾退公租房的“大动作”。

其实,当地公职人员违规占用公租房的事已经存在四五年了。群众的投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。问题明摆在那里,就是一直没得到解决。直到省委巡视组来了,当地才“动真碰硬”起来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?如果省委巡视组没来,会咋样?只有涟源是这样的吗?

观点

出具阴阳检测报告? 二手平台岂能“双标”

二手手机市场水有多深?有自媒体博主披露了在平台转转上的交易实测。同一天内,同一部手机在转转不同的门店买入后再卖出差价巨大,“利润率高达30%左右”,而“阴阳质检报告”是其中的关键词。11月29日,转转公司发布声明称,不同店员对成色判定有主观差异造成了质检报告的不同。

作为中间商,二手平台赚取合理的差价无可厚非,这也是符合消费者心理预期的。在这样的前提下,二手平台大可以直接明码标价来收取检测或是手续费,何必一边四处投放广告,用自己的“权威检测”当作宣传点,一边用阴阳检测报告暗中提高利润?

信用经济时代,诚信、公平的市场法则必须得到捍卫,尤其是高度依赖用户信任度的二手交易平台,更应该洁身自好,自觉维护消费者权益。而此次“阴阳检测报告”引发的舆论热议或许也在提醒,要让二手市场长期规范发展,同样需要官方有关部门积极参与,推动完善检测和定价标准,并进一步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。 据光明网

“让警察帮忙教育孩子” 家长有推卸责任之嫌

近日,四川乐山一位妈妈带着经常偷拿家里钱的孩子去派出所“自首”,让警察帮忙教育孩子新闻引发网友热议。事实上,近年来,被父母“送进派出所”的孩子并不在少数,有的是因为偷偷从家里拿钱,有的是因为偷拿同学的玩具。对此,不少网友发问,总找警察帮忙教育孩子,真的好吗?

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也是最重要的老师。我们也常讲,知错能改,善莫大焉。面对孩子的错误,尤其是一些“小错误”,作为家长理应承担更多对孩子的家庭教育,不能把这种教育责任轻易推给警察,动辄请求民警帮忙教育。

而且,孩子犯错就请求民警帮忙教育的弊病也是明显的。一是有可能因为一次“自首”,孩子认为自己就是“小偷”,进而产生心理阴影;二是家长用警察“吓唬”孩子,会使其对警察产生畏惧感,进而可能会让孩子遇到危险时不敢寻求他们的帮助,甚至对其形成歪曲的理解与概念。相比较而言,真正了解孩子犯错背后的原因,进而从根源上加以及时教育,才是治本之策。 据东方网

来论

“拾金索酬”不等于“狮子大开口”

评论员 陈广江

近日,安徽合肥一名女大学生在餐馆用餐时不慎遗落手机,后被一名男子拿走。男子称,若要拿回手机,女生需向其支付2000元,甚至威胁如果不给钱就刷机。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,民警无权强制男子归还手机,建议失主到法院起诉。

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,“拾金而昧”不仅不道德,亦涉嫌违法。在拾金不昧和“拾金而昧”之间还存在一个“中间地带”——拾金索酬或有偿归还,即拾得人在归还拾得物时向失主收取适当酬劳。近年来,拾金索酬的观念渐被人们接受,但索酬也应有尺度、有底线,一旦“狮子大开口”,就离“拾金而昧”不远了。

《民法典》第314条规定,拾得遗失物,应当返还权利人。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,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。同

时,民法典第316条还规定,拾得人在将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,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,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。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、灭失的,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

显然,本次事件中捡到手机的男子,有返还手机和妥善保管手机的义务。但民法典第317条还明确规定,“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,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。”换言之,捡拾手机的男子可以向女大学生索要相应费用。

我国法律法规并未明确相关酬劳标准,但这并不意味着拾得人可以趁人之危漫天要价。面对没有经济收入、苦苦哀求的女大学生,男子索要2000元并以“刷机”相威胁,显然超过了应有的尺度,甚至有敲诈勒索之嫌。虽然后来该男子将酬劳降为1000元,但其行为的性质并未改变。

其实,拾金索酬的标准并不难界定。单从法理上讲,酬劳标准应当与保管手机所产生的必要、合理支出相关,比如归还手机产生的邮寄费用等就属于“必要、合理”之列,而男子索要2000元或1000元,则明显超出了“必要、合理”的范围。

承认拾金索酬的必要性与合理性,是为了补偿拾得人的相关损失,以一种更加务实、理性的方式弘扬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,而不是为了给拾得人提供发意外之财的机会。说到底,拾得人应得的酬劳应与其产生的损失或付出的劳动成正比,而不是趁人之危“狮子大开口”。

此事属于民事纠纷,警方虽然无权强制要求该男子归还手机,但可以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,讲明利害关系,督促该男子主动归还。如果此路不通,女大学生可以走法律途径维权。

投稿邮箱:qilupinglun@sina.com

小小鹅腿里的“大学之大”,值得教育者重视



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

这两天,“鹅腿阿姨”火了,除了被北大、清华、人大三所高校“争抢”,学生们甚至在寒冬深夜里排队,只为抢一只鹅腿。这件事发生后,人大的反应颇为令人意外,他们迅速找人研究了鹅腿的做法并在食堂平价推出,满足“嗷嗷待腿”的孩子们。

不是高高在上,将学生们排队“抢鹅腿”视为“跟风”嗤之以鼻,而是理解他们们的热情、需求,以及在一只鹅腿上的“情感寄托”。人大的快速反应,犹如一个“孩子抢不到我就上”的贴心家长,告诉学子们“不用羡慕买到的了,我们也有啦!”

同样在这两天,山东理工大学的一张截图也温暖了很多人。事情源于有将毕业的学生在学校专门建立的对话平台上留言“泡芙和泡芙内馅怎么做”“怕毕业之后吃不到”。学校就特意将详细制作方法上传并回复“希望母校味道常伴你左右”。制作泡芙的范师傅也说,“教育本就应该



无论你问我什么,我都会倾囊相授。”

大学是授人以知识的场所,但能影响和教给孩子的却不只有知识。在各种细节中体现出的理解、包容、交流、关怀,同样会塑造人格、激励人心。在这两日频繁刷屏的某社交软件“高校评分”中,获得9.3分高分的居然是江西一所普通大学——景德镇陶瓷大学。学生们说,这里的副校长吕品昌事无巨细地关怀着他们,很多人

都可以跟他微信直接对话,“你给明星发信息他不一定回,但你给‘九口校长’发信息他铁定回”。

这也提醒我们,在教育中除了习惯着眼于完善的设施、优秀的师资、生源及一个个耀眼的数字,也别忘了那些事关学生体验感、归属感、有样学样的“内涵”。一只小小鹅腿里,有真正的“大学之大”,这值得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注。

退票要“情侣关系证明” 这样的规则太奇葩

日前,有网友称在退上海迪士尼门票时被平台要求提供纸质的“情侣关系证明”,引发网友热议。11月30日晚,在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情况下,情侣的票也已经全额退回,平台称已向合作伙伴反馈退票规则问题,将提供更好服务。

用一份开具难度极高的生造证明文件来提高消费者退款门槛,是不是强制交易?毕竟,只要不是已开包装、鲜活易腐、个人定制等影响产品或服务二次销售的情形,消费者的退票权都应该受法律保护。这件事的恶劣程度,还不仅在于证明内容本身的滑天下之大稽,而是商家试图通过设置退票门槛的方式,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、加重消费者责任。事实上,只要可以出示彼时订立格式合同的消费支付记录、单号等基本信息,哪怕不是为本人退款,也不应当受到商家或者平台的无理非难。

退款因为引发舆论热议而特事特办给了,但背后的深层问题还在。围绕退票问题产生的纠纷,不同的维权渠道所消耗成本可能会有差异,不管投诉、举报还是诉讼,成本都客观存在。在消费个体维权之外,执法监管部门也应当即时负起责任,主动收集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、破坏法治市场秩序的各种线索,并积极介入调查,督促整改。 据南方都市报